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探析

巩方舟

聊城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中国·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关键时期, 这一时期, 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诋毁与封锁, 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形象误解与偏见, 中国共产党以理念原则引领、方法策略创新、组织制度保障成功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积极形象, 与国民党的斗争中不断占据上风, 扩大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国际形象塑造对新时代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形象建设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党的形象建设; 延安时期

Analysis on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Shap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Gong Fangzho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China Shandong Liaocheng 252000

Abstract: The Yan 'an period marked a pivotal phase in 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im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During this era, the Kuomintang authorities engaged in smear campaigns and imposed ideological restrictions against the CPC,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rbored misconceptions and prejudices toward the Party. Through principled ideological guidance,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and robust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s, the CPC successfully cultivated a positive global image. It consistently gained the upper hand in its struggles against the Kuomintang, expanded it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and strengthened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The CPC's international image-building efforts during the Yan 'an period hold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and refining the Party's imag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arty image building; Yan'an period

0 引言

延安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进程中的关键阶段, 是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探索革命道路、推进理论创新与制度建设的重要时期, 其历史价值与理论意义具有显著的学理特征。延安时期, 亦被称为陕北时期或“陕北十三年”, 时间跨度从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 至 1948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东渡黄河, 涵盖土地革命后期、全民族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前期, 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从战略转移到战略反攻的完整历史链条。

1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象塑造的背景

1.1 日本侵华加剧与民族矛盾激化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逐步扩大侵华战争, 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妥协, 东北地区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37 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全民族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伐进

一步扩大, 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使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 救亡图存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诉求。许多将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人极其失望, 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将目光聚焦于中国共产党身上。同时, 国民党政府长期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将力量集中于剿共, 导致民族凝聚力涣散。中国共产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号召, 从长征后的陕北根据地出发, 率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并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全党的思想、作风、纪律和形象建设, 在全国范围内树立“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正面形象, 以得到群众信任支持, 凝聚抗日力量。

1.2 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实行封锁

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争夺政治合法性, 不仅实行“党禁”并且开展了多次的“围剿”, 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 1935 年后, 虽然国共合作抗日的趋势逐渐形成, 但国民党仍未放弃对共产党的压制, 一方面在军事上对陕甘宁边区

实施封锁,另一方面在舆论上攻击共产党“破坏统一”“推行赤化”,试图丑化其形象。例如,国民党通过媒体渲染“共产党共产共妻”“破坏传统文化”等虚假言论,加剧民众误解。毛泽东说:共产党人“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人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敬师长,不讲道理,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¹“把马克思主义放在显微镜下去检讨”。²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理论宣传、实践展示等方式,重塑“抗日、民主、进步”的政党形象,回应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进攻,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

1.3 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解偏见

抗战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认知存在偏差。由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党禁”制度,所以共产党党员大多是地下工作者,延安时期的很多民众对共产党认识不清,外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是不清。同时国民党利用其宣传优势,在国统区通过报刊、舆论抹黑共产党形象,对国际上的形象传播有重大影响,部分国际势力将共产党视为“苏联的附庸”或“激进武装”。并且,日本侵略者通过舆论抹黑共产党,企图削弱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加速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支持,苏联共产援助和海外华侨共情,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形象建设,向外界展示其作为抗日主力的合法性与正义性,打破敌对势力的舆论封锁,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正名。

1.4 中国共产党组织物质资源上的不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内普遍是存在着经济发展落后、生产发展不足,人民日常生活物资紧张的情况。“执政形象的优劣,是由执政绩效决定的”。³当时人们提起到陕北,会联想到贫穷和落后等形象,这影响着人们对于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正确判断。随着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向“局部执政政党”转型,也需要在根据地内赢得民众认同。当时根据地多位于经济落后、文化闭塞的农村地区,也受到人们获取信息渠道匮乏限制,部分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如土地改革、妇女解放等存在疑虑。因此,党需要通过形象塑造,让群众认识到其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从而巩固执政基础。

2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塑造上的探索

2.1 以主动出击的理念引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建设永葆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道路。思想对实践具有先导性作用,要不断的从思想上筑牢根基,才能使政党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能够在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人民不断夺取新的胜利。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形象建设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必须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全党,使党成为一个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找到出路。

共产党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广播电台使用,对外翻译中共资料,积极接受外来采访考察等积极塑造共产党的形象。从整体上看,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党的形象塑造上的努力体现着以主动出击的理念作为引领,同时依据根据地内实际建设情况,坚持实事求是的实践,极大的改善了共产党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形象。

2.2 与国际社会积极互动

在延安时期,中共高度重视外国记者来访,将其视作与外界交流的宝贵契机。当时,国民党对中共进行政治隔离与新闻封锁,为打破这一局面,让世界认识真实的共产党,党中央经慎重考虑,决定邀请有正义感、值得信赖的外国人前来边区采访报道。毛泽东提议挑选这样“可以信赖的外国人”,经宋庆龄努力协调,埃德加·斯诺成为访问陕北苏区的合适人选。1936年6月,斯诺抵达保安县城,受到中共中央热情接待,周恩来亲自迎接并表示全力支持其考察,毛泽东更是与斯诺进行多次长时间深入交谈,解答其各类问题,内容涵盖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抗日形势等,还抄赠《七律·长征》,这也是该诗最早在国外传播。斯诺随后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让世界首次看到一个真实且充满希望的红色中国。

1944年,国际形势变化使英、美等国在华人士对中共抗日根据地兴趣渐浓。驻华外国记者联盟上书蒋介石请求访问陕北及延安,蒋介石意外批准。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当即批转电报给十几位同志传阅。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多次邀请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访问延安,并精心筹备接待工作。周恩来亲自主持,强调宣传要实事求是,以诚恳态度交友。6月9日,参观团抵达延安,毛泽东设宴招待,12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5页。

2.郑学稼:《第三国际解散与马克思主义》,《中央周刊》1943年第5期。

3.赵耀宏:《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形象探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日下午会见并回答问题,畅谈国际国内形势,强调中国需实行民主以战胜日本法西斯,之后还与部分外国记者深入个别交谈,介绍抗战形势与中共政策。朱德等领导人也积极接受采访,全方位介绍中共有关政策,让外国记者深入了解中共,“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国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⁴,也使中共借此了解到国际各方对自身及中国局势的看法等重要信息。

在接待外国记者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秉持“开放”和“真实”原则,力求展现最本真的革命根据地风貌。为满足记者对边区情况的迫切求知欲,边区政府各部门负责人积极整理并分发书面材料,这些资料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像《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详细介绍边区民主选举制度、经济发展规划等,让记者们先从文字中初步了解边区建设成果。同时,中共中央充分给予记者自由参观考察的权利,允许他们走进边区的学校,亲眼见证学生们在简陋环境中刻苦学习,了解新民主主义教育理念的实践;踏入医院,观察战时医疗体系如何保障军民健康;探访报社,知晓中共的思想和政策如何通过文字传播。中共中央还精心组织多场座谈会、招待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与记者面对面交流,坦诚解答有关抗战策略、根据地发展等问题,在轻松氛围中阐释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让记者们从多维度、深层次全面认识边区,打破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将真实的延安传递给世界。

2.3 积极利用传播媒介

在延安时期,中共深刻认识到媒介宣传对传播形象、凝聚力量的重要性,着力创办和发展自有媒体。为此专门成立由毛泽东负责的宣传委员会,统筹领导宣传工作,大力推进新华社、《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媒体建设,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成功创办《新华日报》。延安新华社面临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等困境,工作人员凭借坚定信念,用简陋设备日夜工作,收集、整理和播发重要新闻。《新中华报》积极宣传中共抗日主张,报道边区建设成就;《解放日报》作为党在根据地的大型日报,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共政策,发表大量社论和评论,引导舆论方向。《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创办尤为不易,面对重重阻挠,报社人员坚守阵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行径。这些报刊突破重重封锁,将内容发行至敌后抗日根据地,部分还传入国民党统治区,

打破信息壁垒,有效扩大了中共影响力,让外界清晰了解中共抗战决心与理念。

在延安时期,周恩来领导下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成为向国际传播中共理论与主张的重要桥梁。当时,为打破国际上对中共的误解,让世界理解中共在抗战及中国革命中的理念,中共积极组织力量,将重要著作译成外文。《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便展现出对抗战战争的高瞻远瞩,周恩来委托宋庆龄安排爱泼斯坦等人将其译成英文,毛泽东还特意为英文本撰写序言,希望借此书唤起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支持。《新民主主义论》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阶段与方向等重要理论,也被迅速组织翻译传播。同时,《论联合政府》等数十篇著作也被译成外文发表。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辅助作用,协助进步团体和人士,在香港编译出版毛泽东著作。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政治环境,成为这些著作向海外扩散的前沿阵地。通过这些努力,国际社会更深入了解中共的革命理论、抗战策略及未来愿景,极大提升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与认知度。

在延安时期,电台广播是“对外宣传最有力的武器”,新华广播电台作为中共对外宣传的创新媒介,打破了地理与信息的封锁,成为向世界传递真实声音的关键渠道。1940年12月30日,新华广播电台在延安窑洞里诞生,面临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等重重困难,工作人员凭借顽强毅力与智慧,保障电台稳定运行。电台每日定时播音,向外界播报根据地内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战略部署与战斗成果,让国际社会知晓中共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同时,电台也积极报道边区在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的成就,从大生产运动改善民生,到民主选举展现人民当家作主,全方位展示根据地的蓬勃生机。1944年9月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展对外英语广播,英播部主要编发《解放日报》上的新闻,还出版重要文件的翻译本,如国共谈判的文件、毛泽东的讲演等。⁵这些真实、鲜活的内容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四面八方,为长期被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的国际社会,开辟了了解中国抗战真实情况和中共抗战贡献的全新窗口,有力提升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与影响力。

4.《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5页。

5.万京华:《红色电波,让世界听到延安的声音: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创建始末》,《对外大传播》2006年第5期。

2.4 宣传统筹组织制度设计

面对多种外宣方式的工作,建立宣传统筹机制是关键举措。中共成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亲自领导,统筹整合新华社、《解放日报》等重要媒体资源。宣传委员会以定期会议为重要工作方式,成员们深入研讨国际形势,分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变化,以及国际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关注点;同时紧扣党的中心工作,明确在不同阶段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设、根据地发展等方面的宣传重点。基于这些分析,委员会部署宣传任务,给新华社下达采访报道方向,为《解放日报》确定社论主题。在稿件审核上,严格把关重要稿件,对涉及中共抗战主张、根据地建设成就等关键内容仔细斟酌,确保对外宣传口径一致。通过这样的统筹协调,各媒体分工协作,宣传力量得以有效整合,将中共坚持抗战、追求民主等理念精准传播,有力提升了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为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封锁并规范国际交往,中共创新性构建专门外事组织,以系统性机制推动对外形象建设。1944年,中央军委外事组在延安正式成立,这一机构由叶剑英担任组长,标志着中共外事工作从零散化向专业化转型。外事组的核心职能围绕国际交往展开,一方面负责接待美军观察组、外国记者等国际人士,从食宿安排到行程规划均制定标准化流程。在接待美军观察组时,外事组不仅协调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会见事宜,还精心设计考察路线,安排记者参观边区工厂、学校及八路军总部,确保国际人士全面了解根据地实况;另一方面,外事组统筹涉外事务的策略制定,包括拟定审核英文资料翻译,并建立《接待工作细则》等制度,对翻译礼仪、信息披露范围等细节作出规范。

3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塑造的新时代启示

3.1 坚持自主性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形象塑造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性,不受外部的干扰,宣传自身的抗战主张和革命理念。新时代背景下,中国更加需要坚守自主性。在对外传播中,需要立足本国实际国情和发展道路,坚定文化自信,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从中国的视角讲述脱贫攻坚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科技创新领域的重大突破,以自主独立的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方案,避免陷入西方话语陷阱,确保国际形象塑造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3.2 利用好“第三方”党外叙事

中国共产党通过邀请“第三方”,斯诺等外国记者和

国际友人,他们用自己的视角向世界展现了真实的延安,这种“第三方”党外叙事打破了当时国民党的信息封锁,极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可信任程度。在新时代,我们同样要重视发挥“第三方”力量。积极邀请国际知名学者、媒体来华考察,让他们亲身感受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客观、中立的立场讲述中国故事;另一方面,鼓励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群体等自发传播中国声音,借助他们的独特身份与视角,从多元维度展示中国的文化魅力与发展成就,形成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国际传播体系。

3.3 完善预警针对性机制

中国共产党在面对国民党的舆论抹黑与国际误解时,虽条件艰苦,但也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应对策略。新时代,国际舆论环境更加复杂,网络信息传播速度快、影响的范围广,完善预警针对性机制尤为重要。需要建立健全舆情监测系统,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实时追踪国际舆论情况,尽早发现可能影响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信息。针对不同类型的舆论信息,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方案,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反应,及时、准确地对外发声,澄清事实、打破谣言,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维护良好的国际形象。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著.毛泽东选集[M]. 人民出版社,1991.
- [2](美)斯诺(E.Snow)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M]. 三联书店,1979.
- [3] 李金玲. 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研究综述[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22(06):67-73.
- [4] 徐世强. 延安时期助力中国革命的国际友人[J]. 党史博览, 2013,No.229(07).
- [5] 卢佳伶, 梁长平.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设探析[J]. 公关世界, 2021,(14):84-86.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80.
- [7] 吴阳松, 谭敏.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党的形象建设重要论述释析[J]. 思想教育研究, 2022,(11):38-43.
- [8] 苏晓涵, 陈勇.《中国解放区实录》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塑造[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42(02):132-140.
- [9] 季正聚, 马璐.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建构的历程、经验与路径[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2,20(03):1-9.
- [10] 张俊霞. 政党形象建构: 动因、价值和路径[J]. 理

论界, 2013,(02):25-28.

[11] 孙景峰, 陈倩琳. 政党形象: 概念、意义与建设路径[J]. 探索, 2013,(03):23-27.

[12] 邵红蕊, 任慧英.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建设的逻辑理路及成效[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24,41(01): 147-156.

[13] 罗嗣亮, 马丽. 延安时期中共文艺政策及其对党的形象塑造的推动[J]. 粤海风, 2024,(06):23-30+2.

[14] 杨红运. 延安时期外国记者笔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及意义[J].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3,8(08):59-71+122-123.

[15] 邬建佳, 钱超. 延安时期党的形象自塑实践及其现实启示[J]. 理论观察, 2021,(10):10-13.

作者简介: 巩方舟(2002-), 男, 汉族, 山东省临沂市, 硕士在读, 研究方向: 党的建设与国家治理。